

中国现代诗学与 美学的开端

王柯平 主编

跨文化视野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跨文化视野丛书

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的开端

王柯平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的开端/王柯平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6

(跨文化视野丛书)

ISBN 978-7-5452-0658-6

I. 中... II. 王...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②美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②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510 号

策 划 王 刚

责任编辑 许 铭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跨文化视野

书 名 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的开端

主 编 王柯平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658-6/J.381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主 编：王柯平

执行主编：胡继华 杨 平

编 委：（以拼音字母为序）

胡继华	Curtis Carter
梁 展	David E. Cooper
刘 燕	Edward Demenchonok
卢春红	Eugenio Benitez
邱 鸣	Joseph Moargolis
唐晓敏	Karl-Henz Pohl
王柯平	Leonidas Bargeliotes
杨 平	Nicholas Bunnin
院成纯	Panos Ellopoulos
袁宪军	Peter V. Lamarque
张洪仪	Richard Lynn
周 烈	Robert Wilkinson

本期编辑助理：庞红蕊 林振华

编者寄语

不可否认,该丛书取名为“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Views),是全球化或全球地域化这一历史语境及其现实进程的特定产物。究其要义,“跨文化”(transcultural)既是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跨越文化的思想探索。这种学术追求,不仅需要深入理解他者,而且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故以批判思维与建设意向并重的方法,力求在微观或宏观的相互比照中反思他者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尚、伦理范型与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流变及发展。

当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跨文化”可谓一种事实。

远溯西方历史之源,我们看到,以地中海为圆心,欧亚非三洲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汇聚于希腊,在对抗、冲突、和解与会通的变奏中,不仅成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辉煌,而且锻造了欧洲文化传统的根基。其中,令西方人感到自豪而又让其彼此博弈的三大“唯一神教”,都无不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实践结果。

返观中国历史之本,我们发现,以长江与黄河为中轴,华夏各地文化如万壑争流,漫溢神州,绵延不已,淀积深厚,使今人亦能觉解其文化传统的精微大义。尤其是东汉之后,佛入华土,儒、道、释三教并立,相育而不相害,构成了盛唐气象的壮美品格,其思想与精神的血脉依然泽被今世。

细察中西文化交通的情形,我们又看到,首先是“中学西传”,然后是“欧风东渐”,最后才是“文化全球化”。中国明代当值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与《易经》——开始和缓“西传”,并被转化为欧洲文化自我建构的内在资源。在欧洲汉学语境下,启蒙之后的欧洲就是“中国之欧洲”(艾田伯语)。晚清至民初,中国遭遇千年未有的“创局”(王韬语),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与政制——的暴戾“东扩”,造成了第二次天下道术的裂变。回眸百年,其间惊涛骇浪此起彼伏,中国学统、政统与道统尽遭冲击,致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精神沦落到“融合”与“抵抗”(萨义德语)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无疑渗透着中国对西方的亲近与疏远的矛盾心态。20世纪中期之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变成了现实,欧洲文化重心偏向美洲,其文化精神化为冷酷抽象和幽灵一般的资本逻辑,展开了对世界的新一轮掠夺。不过,这一次却借助国际资本与商品的流动,加快了“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双轮转速。不论我们怀着怎样的矛盾心情来审视“全球

化”现象,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场通过现代传媒而时刻发生在眼前的跨地域经济与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正在将“中国的中国”与“亚洲的中国”转变成“世界的中国”(梁启超语)。

另外,从现实的文化境遇来看,“跨文化”也是一种姿态。

作为一种意义实践,文化是一种建构超越性精神王国的努力。所谓“超越”,即超越日常经验与视野的局限,上达精神解放与自由的向度。《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天下之故”。话虽如此,然文化实践绝非故步自封或画地为牢之事。相反,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旨在促进人文化成。所谓“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乃是以人文的精粹涵养在世的生命。而“文化”之“化”,成为文化的活力之本。而“跨文化”之“跨”,则是文化的求生之道。从精神超越的向度上看,跨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跨越界限和寻求普世价值的精神姿态。“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邵雍语)。惟其秉承这种“以物观物”、“以天下观天下”的精神姿态,方可切实体悟“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的至理。也正是因为怀藏一颗“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的道心,“念民生艰难,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悲情的康有为俯读仰思,撰述《大同书》,感发“经纬世宙之言”。如今,这种才思与感念,更需要从东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予以重新探讨和评价。

再者,从理想的文化境界看来,“跨文化”应属一种愿景。

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跨文化研究致力调校视野,矫正立场,摆正自体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从而对于理想的交往情境有所承诺,有所期许。在全球时代断裂又连续的流动景观中,究竟如何摆正中国在世界上的关系?从中国看世界,似乎太狭隘。从西方看中国,显然太偏颇。从世界看中国,难免于虚空。与这三种立场有别的是,跨文化研究倡导以全球文化为视野,以人类价值为瞩望,以观照文化间关系为志趣,以期超越地域局限而寻求普遍沟通。

鉴于此,在跨文化研究所成立8周年之际,我们全所同仁与国外部分学者联手协作,创办这份学术集刊,旨在为有志于跨文化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平台一角,以期促进互相交流和推动学术发展。本刊将摈弃一切学术门派的褊狭心态,拆除一切人为的学科藩篱,以开放的胸襟以体天下之物,领纳国内外学术文化资源,保守一份对于学术的真挚和对价值的关爱,从而为学术的精进和境界的提升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刊计划每年编辑出版一卷,每卷篇幅30万字左右。所设栏目包括“中国诗学”、“西方诗学”、“美学新解”、“比较文学”、“域外文学”、“跨文化之思”、“经典绎读”等,每卷将根据来稿和选稿情况酌情调整相关栏目,敬望学界方家时贤关注和支持。

“跨文化视野丛书”编委会

2009年9月18日

目 录

编者寄语	001
------------	-----

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的开端

中国诗学美学现代转化的社会文化语境/聂振斌	001
境界“为探其本”释证/王柯平	016
同一与杂糅/卜松山(Karl-Heinz Pohl)/文 李玲/译	036
“血书”“孤愤”/胡继华	047
“无我之境”与“非个性化理论”之辨析/刘燕	056

经典译读

Daimoni isos/陈中梅	065
苏格拉底、哲学之爱与美国自然主义/柯比(Christopher Kirby)/文 刘检/译	103
柏拉图论美/库特拉斯(Demetrios N. Koutras)/文 陈曦 马丽娜/译	109
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喜剧诗人/克莱(Diskin Clay)/文 冯幸 张平/编译	115
朱熹的道德化诗学观/冀秦/文 陈昊 刘洪飞/译	123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源始方案/佚名/文 林振华/译	131
论尼采晚期的生命学说/阮成纯	134

跨文化之旅

- 跨文化美学是否可能? /拉马克(Peter Lamarque)/文 刘检/译 144
- 诗、禅宗和跨文化美学/索维玛(Sonja Servomaa)/文 任晓寅 王家鑫/译 150
- 古雅的莲花,艳丽的玫瑰/米山胜 (Masaru Yoneyama)/文 王璨 宫源/译 156
- 美的维度:弥合情感与思维的鸿沟/马齐雅诺(Grazia Marchiano)/文 陈佳赓
曹雅丽/编译 174
- 清明之心与自然之爱/北村知之(Kitamura Tomoyuki)/文 张林琳
田一哲/译 183
- 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贝尼特斯(Eugenio Benitez)/文 赵冰
奥迪锐娜王/译 191
- 美学与跨文化概念探微/科尔曼(Elizabeth B. Coleman)/文 张舒曼
杨旭/译 200
- 安德烈·马尔罗与现代跨文化艺术观/埃伦(Derrick Ellen)/文 曲晓蕊
刘杰/译 214

美学探幽

- 艺术的状态/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文 于涓/编译 227
- 美的持存/库珀(David Cooper)/文 刘小禾/译 241
- 美学史写作的深度反思/伍德费(Richard Woodfield)/文 周萍 庞红蕊/译 251

中国诗学美学现代转化的社会文化语境

聂振斌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社会从 1840 年就开始向现代演变,而中国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学术思想,为什么在迟至六十年后的世纪之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开始现代转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中国诗学美学的现代转化不是同步发生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是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被帝国主义侵略“逼”出的结果;社会转型的动因不是内在的自觉,而是外在强加的;不是先有思想启蒙,后有社会政治改革(或革命),而是相反,先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而后进行思想启蒙,与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化情形是不同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败,才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社会转变了,文化思想的变革却没有跟上,因而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果也无法巩固,结果再从头开始——进行思想启蒙。这里存在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近代概况》一文中,把这个认识过程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因而产生“洋务运动”;二是“从制度上感到不足”,因而产生戊戌变法维新;三是“从文化上感到不足”,因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说明一个认识规律:人们的眼光总是先看到事物的形、质及其所表现的物质力量(如器物、技术、制度、组织形式),然后才逐渐认识到无形无质的精神力量;随着前一种认识而引进的西学主要是科学技术与工具器物、社会制度与政治法律及其理论,随着后一种认识而引进的主要是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

一、“洋务运动”:“富国强兵”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并以中国失败为结局。帝国主义通过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剥削劳动力等方式以满足自己聚敛财富的欲望和称王称霸的野心,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输入中国,从此使中国社会开始殖民化。这便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

篇,也是一种不光彩的开篇。这种不光彩的历史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理,也彻底撕碎了清朝皇权老大自尊的面子,放下架子,开始向洋人学习,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从而产生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其结束的标志。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列强效仿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通商口岸,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而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经过十五年的时间,清政府才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平定农民起义的“胜利”,清王朝的统治者看到了洋枪洋炮和钢铁船舰的威力,于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班人,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时期,虽然中国社会依然贫穷落后,政治依然腐败没落,但战争毕竟少了一些,社会较为安定,生产有了恢复和某种发展,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洋务派以“富国强兵”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的工业交通和新式学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传播西方文化和戊戌变法改良运动,培养了人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对于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有了新认识:第一,不局限于购置西方的船、炮、武器,而且着手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即兴办“船政学堂”、“制造局”、“机器局”、“枪炮厂”等。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第二,不仅要用外国的人才力量来养兵练兵,而且要着手建立新式学堂,派出留学生,以培养自己的军事科技人才。第三,不仅要“强兵”,尤其要“富国”,国不富则兵难强;认识到“富”与“强”的密切关系,而“富”是首要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第25页)。

“洋务派”还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更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当然,他们所要学的“文化”是与技术、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而不是人文学方面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诗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主导方面也不是政治学、社会学。因此,在如何处理西学和中学的关系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设学》)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冯桂芬说:“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①他们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优越于西方,只是在技艺方面不如西方先进,因此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洋务”也就是买进西方的器物,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便“为我所用”,至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礼教仪式等等这些“体”是不能变的。换

^① 《采西学议》,《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9页。

句话说,生产技术,交通工具,生活用品,要向西方看齐,越是先进,越是“现代化”越好。典章制度和思想观念却仍然要坚持老祖宗的那一套。这个时期翻译西洋书籍和引进西方科技都是空前的。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学馆,专门译介西洋书籍。从1868年建馆到清末共译书190种,其中大部分是科技方面的,还有少量的历史和政治书籍。附属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文馆,也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李善兰,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作出重要的开拓性贡献。

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耗资巨万,收效甚微,既未富国,也未强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也寿终正寝。“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人一致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人们纷纷指出:“试观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究未尝参一官,治一罪,以照炯戒……办一事而未知底蕴,事事仰借于人。其来也不过徇情面,倚声势,大率纨绔居多之人,本不知稼穡之艰,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②“每年所动用款以数百万计,而所成之物,若经由外洋购买,或由洋匠承包,费可减半。官厂每制成器,价比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经,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百年,终无生色。”^③他们都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官”字。“一自官为督责,则所用司事,皆官场举荐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屡满之患。商人沾染官气,则凡达官过境下临,布局亦必多方酬应,献媚取怜,而局用浩繁矣。”^④“或谓中国招商局之设,历有年所,而不见大利者,何故?曰:招商官办也,使无今时官场之积弊,其美利之兴何止十倍?”^⑤“……姑勿论事之成否,而出款已不可数计矣。无底之壑,终必匮乏,不待智者知其必败也。”把官场上的一套关系网和官僚作风用到工厂、公司中去,真是积习难改,积重难返!

总之,因为是官办,出之于“公”,归之于“公”,与自己切身利益没有直接联系,成本高低,利润大小,效益有无等项,也就无须去费精神作周密思考和精心筹划。因为“官为督责”,职司用人,都由官方举荐,任人唯亲,拉拢贿赂也随之而来。所以当时占据制造局、公司、工厂的重要位置者,大多是纨绔子弟,与“官”有裙带关系者。这些人既无充分的知识准备,又没有管理经验,更缺乏社会责任感,唯一所有是其血统“高贵”。他们最为“内行”的是:讲排场,摆阔气,阔少的作风带到工矿企业,贪心不已,欲壑难填,哪里还能有振兴民族工业之想!所以“洋务运动”费时三十年,用资浩繁,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894年所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又是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洋务运动”所筹建起来的北洋水师,将士们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却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这次战争的失败

② 俞赞:《恤商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0页。

③ 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8页。

④ 吴佐清:《中国仿行西法纺纱应如何筹办俾国家商民均获利益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7页。

⑤ 何启、胡礼恒:《新政论议》,《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2页。

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没落的本质,也是对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最后检验。辜鸿铭说:“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指曾国藩——引者)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⑥总之,清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技术工具、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是构成有机整体而发挥作用。

二、戊戌改良与辛亥革命

甲午之败,使许多知识分子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这是中国不能富强的根本原因,因而先后产生了康梁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武装斗争。

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不能富强,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缺少船坚炮利的武器,而主要是因为政治昏庸,制度朽败。北洋水师虽然用西方先进的船炮武装起来,武器不谓不精良,官兵不谓不勇敢,结果却是全军覆没的悲壮下场。这说明政治腐败,再好的武器,再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运用和充分的发挥。因此必须改良政治,变法维新,这才是最重要的。康有为说:“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⑦因此要“破除旧习更新大政”,^⑧梁启超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在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敢言矣。”^⑨

改良主义运动在指导思想上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而是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进化论哲学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学引进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儒学与佛学结合起来加以发挥。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梁启超的政论文章,都是中西文化融合之产物,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他们都认识到文化思想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因而大造政治改革的舆论,但在认识上只限于政治制度层面,强调制度、法律的改良,但如何保证这种改良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并取得最后成功,缺乏深谋远虑和人才的培养、储备,因而很快就失败了。在传播西学方面,也不同于以科技书籍为主的“洋务运动”,翻译、介绍了大量与

⑥ 《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4 页。

⑦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54 页。

⑧ 同上书,第 270 页。

⑨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 页。

政治改良密切相关的书籍。尤其是严复,最先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改良派否定了洋务派的思想 and 实践,认为必须从政治上动一次大手术,排斥顽固,剪裁冗员,选贤任能,进行变法维新,实行开明政治,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改良主义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这些却是成功的有益之举。

与改良主义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也是从甲午之役的教训中否弃了“洋务运动”。但他们与改良主义者不同,对清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认识到它的腐朽反动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因而不是对它进行政治改良,实施君主立宪,而是进行政治革命,以暴力推翻它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识之志,岂无抚膺!”^⑩由于清王朝已经腐朽没落而又顽固、反动,因而激发了爱国志士揭竿而起,组织各种革命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孙中山把分散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革命力量壮大起来,终于取得辛亥武昌起义的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使全国人民激动不已。然而辛亥革命只推翻了清政府,很快就大权旁落,被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称帝,封建主义死灰复燃,帝国主义仍赖着不走,不仅没有实现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目的,反而滋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这些封建军阀之间,或者互相勾结利用,或者挑起战争,你争我夺;他们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大作丧权辱国的买卖交易,以维持自己的地位或地盘,弄得战争连年,灾难重重,民不聊生,国也不国。梁启超说,从甲午年至民国六七年的二十年间,政治界虽然变化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地说,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都搬过来,万事就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件件都落空,因而“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⑪。由于辛亥革命终于失败而引发出这一系列恶果,使人们觉得更为重要的不是政治改良、暴力革命,而是革新文化精神,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焕发人心的觉醒。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为目标,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提出要“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⑫。他所说的“富强之学”已不是洋务派的“制器之法”,也不限于改良主义的制度与法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思想体

^⑩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91 页。

^⑪ 以上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237—240 页。

^⑫ 同上书,第 792 页。

系,如国家学说、经济理论、自然科学、道德观念、哲学世界观等。不过,当时人们的眼光仍然集中于政治革命和武装起义上面,强调的是国家的“富强”,而不是人的革心洗面,塑造现代的人格精神。

革命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对待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上,二者的认识差不多,都未把思想启蒙之事提到革命斗争的日程上来,依然缺乏深思熟虑。在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观点、态度还比较一致或接近:都主张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以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

三、文化救国思潮的形成

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政治改良、暴力革命,中国的自强御侮、振兴中华的民族大业,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针对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在做新的思考。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都“拿来”试用过了,结果都不灵验。症结就在人的精神那里,人的思想、观念依旧,新的技术、制度仍然无处安放。所以必须革新文化,通过学术、教育和文学艺术,改造国民性,培养革新人才。从上个世纪之交至袁世凯封建复辟,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救国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根源。这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可以区分为三大支流: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艺救国论;二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术救国论;三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论。

(一) 梁启超的文艺救国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的梁启超认为政治改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从文化精神入手。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一文中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巷,处处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⑬。因此,梁启超从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报刊,进行思想宣传,大造革新舆论上。他认为革新文化精神即改变人的心理、思想、观念,是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而文学艺术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所以首先要革新文艺。他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撰写“诗话”,发表论文加以鼓吹。他甚至认为小说革命是社会一切改革的前提条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是那个时代开风气的人物,他的以文艺改造国民性,以文艺救国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如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弃医就文,就是明显例证。新文化运动后,梁启超退出政治舞台专门从事学术教育,

^⑬ 《国民十大元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

也是以革新国人的心、人格为己任,他仍然重视艺术教育,积极提倡“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他对古代诗词、民歌的美学研究,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的专题研究,以及《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论文,都具有开创意义。

他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是最早吸收西方文艺思想并与中国固有的文艺思想融合而创新的例证。他重视通俗文艺的小说、民歌,并把它们提高到与“六经”同等的地位,正是受西方现代平民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他把西方的某些美学观点与中国固有的审美思想相结合而建立自己的新观点,并以此研究中国的“美文”(即韵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都是梁启超现代新文化观的一种表现,是中西美学思想融合的产物。梁启超把中西文化融合出新,形象地比作“结婚生子”。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大文明结婚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如何做好中西融合,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新文明新文化?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对自己固有的文化要“尊重爱护”,要有“诚意”的同情,做到“以固有的文化为基础”(蔡元培语);其次,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即科学方法去研究西学和中学,从而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吸收,才能做到“择善相从”;有了以上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融合、消化、出新才成为可能,也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总之,梁启超认为文化、学术、艺术都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的营养,不断地创新,才能发展,才有生命力。因此,他在《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说》、《欧游心影录》等篇中,提出“除心奴”、反对“空依傍”的主张。所谓“除心奴”,就是清除盲目崇拜古人、洋人的心态。要除掉这种奴性,“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说》)与“除心奴”密切相关是切忌“空依傍”。所谓“空依傍”就是自己心中无数,一切“仰俯随人”,拿别人的言说作为“金科玉律”,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梁启超说,“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欧游心影录》)。

(二) 王国维的学术救国论。王国维较早批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诸君出于政治目的急功近利,见解短浅,毫无学术价值。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总结了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初年学习西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所译之书“皆形而下之学,与吾国思想界无丝毫之关系”,改良派的严复虽译介了英国功利论和进化论哲学,但他的兴味“不存在于纯哲学而存在于哲学之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也。”近

几年某些人介绍了法国 18 世纪的自然主义,一时学海波涛沸腾矣。然而附和此说者于自然主义的根本思想懵无所知,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由学术方面观之,谓无价值可也。他认为接受西学之影响而改造我国古代之学说,于我国思想界占一时之势力者,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谭嗣同的《仁学》,也都因其政治兴味而缺乏学术价值。他说,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汗默德之野心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四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政治上之事业企图,同归于失败矣。”至于谭嗣同之《仁学》,“则出于上海教会中所译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学之以太说,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也。人之读此书者,其兴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见。”而且,这也正是此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它的价值与命运,与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完全相同,也是可想而知的。^⑭ 王国维从学术界思想的角度对康、谭的批评,入木三分。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乃是探索人生真理,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永恒事业,不应抱急功近利的态度,更不要为一时的利益需要而阉割真理。这里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技术、经济、政治的改革,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信仰理想,一言以蔽之,与人们的形而上追求,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王国维看来,二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及当时学术界只见技术、制度、法律等形质层面(形而下),根本忽视了西方文化更深层的真精神,也就是形而上的真理,因而注定要失败。王国维之所以从事哲学、美学研究,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正是出于这种爱国动机。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这即是说,哲学和艺术具有永恒的价值,不是一时的功利事业所能伦比。

在现代中国,王国维最早提出“学术独立”的主张,认为学术不能依附于政治。因为政治专讲利害关系,急功近利,没有超越眼光。王国维批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突出缺陷是:重实用而忽视学理;重政治而轻视其他职业,以当政治家为最高尚最光荣。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如孔子墨子,诗人如屈原杜甫,都想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而不安心于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这种唯政治功利主义,从古流传至今,遂成一种积习难改的社会风气,从而妨碍学术和教育的独立发展。他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说:“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

^⑭ 以上均见《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中于官之一字。”他尖锐地指出：“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此言令人振聋发聩！又说：“今之人士之大半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于官之一途，而里面之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事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王国维的这些批评，在今天更有针对性，更具针砭意义。

（三）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蔡元培很早就抱着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在清朝翰林院任编修时，充分利用这里的条件，博览群书，关注时势，搜集国外教育经验资料，形成了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这是他题写的条幅，贴在京城寓所的墙壁上以自况。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深感清政府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毅然放弃翰林院的高官厚禄，不告而别，离京南下从事新式教育实验。^⑮他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⑯蔡元培认为，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从教育入手，没有首先培养足够的人才，而是靠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必然形单势孤，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所以要救国必须从革新教育入手，用新的文化精神培养新的人才，积蓄力量，积少成多，汇江河而成大海，终有成功的一天。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总结洋务运动以来向西方学习的经验，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⑰所谓“纯粹科学”指的就是要建立现代学术研究包括科学和人文学两个方面。教育与学术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根本途径，是立国之本。蔡元培说，“文化的内容，方面虽多，归宿到教育。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和艺术。”^⑱蔡元培所说的“美术”就是艺术或文学艺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这里的“美术”实际上不是指具体学科，而是代表教育的感性内容，用“科学”代表教育的理性内容；教育只有感性内容与理性内容紧密结合，均衡发展，才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蔡元培非常重视美感教育、艺术教育，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确立、发展、完善了中国现代的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体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

蔡元培又说：“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其是一切事业之基础。”“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

^⑮ 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1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⑯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8页。

^⑰ 《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2页。

^⑱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